

半殖民地中国的反帝话语建构

李永东

(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 半殖民地中国的反帝话语呈现出“有限反帝”与“向内反帝”两种主导倾向, 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风貌与反帝书写模式。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存在状况极为复杂, 当局的反帝态度随时局而变, 外交话语对于列强的描述在“帝国”与“友邦”之间不断切换。在多方势力博弈的历史背景下, 反帝话语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 呈现出“有限反帝”的书写状况。反帝书写常常以“反资”代替“反帝”, 外国人形象通常处于缺席状态或被后台化处理, 近洋人物成了帝国主义批判的主要对象, 由此带来了“向外反帝”书写的薄弱和“向内反帝”书写的繁盛。“向内反帝”话语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反帝反殖书写, 也为拆解半殖民地的主奴社会结构提供了方案。

关键词: 半殖民地; 帝国主义; 有限反帝; 向内反帝; 向外反帝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5)02-0182-08

杜赞奇认为, “在中国, 帝国主义的存在当然受到普遍痛恨, 反帝则是 20 世纪前 50 年中国一切政治运动的核心”^[1]。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 清末“改良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评述, 却是自我批判的多, 而反西方的少”^[2](385)], 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也“把中国弱小归咎于他们自己, 以此为代价而继续相信文明与强权的一致性”^[2](452)], 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反对西方帝国的强权上。以上两种观点看似矛盾, 实则道出了半殖民地中国反帝话语的特殊形态, 提醒我们对习焉不察的“反帝”概念加以重新理解。通常而言, 近代中国的革命任务为反帝反封建, 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性质为反帝反封建的文学, 但是回到历史与思想文化的发生场域, 会发现半殖民地中国的反帝话语呈现出“有限反帝”与“向内反帝”两种主导倾向, 并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风貌与反帝书写模式。

一、“帝国”抑或“友邦”: 反帝力量的激发与控制

提到“帝国主义”, 我们脑海中马上会冒出一句台词: “打倒帝国主义。”不过, 在文献资料中, “帝国主义国家”还有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称呼——“友邦”。鲁迅的《“友邦惊诧”论》一文对“友邦”的嘴脸进行了刻画, 《国际联盟盟约》^[3]却表明“友邦”之间多少存有相互约束的善意。实际上, “帝国主义”在半殖民地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存在, “弄得中国平民眼花缭乱不知是敌是友”^[4], 当局的反帝态度则因时势而定, 其政策缺乏连贯性和稳定性。在半殖民地中国, 内忧与外患相交叠, 外交与内政相牵连, 因而报刊新闻与外交辞令中的列强形象, 时而为万恶的“帝国”, 时而为亲善的“友邦”。1922 年, 中、美、英、法、意、日、葡、比、荷等九国共同签订的条约规定, “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

收稿日期: 2024-12-07; 修回日期: 2025-02-14

基金项目: 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半殖民与解殖民的中国现代文学”

作者简介: 李永东, 男, 湖南永兴人, 文学博士, 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联系邮箱: liyongdong2001@sina.com

全之举动”^[5]。实际上，“革命总有外国支援者”^{[2](3)}，辛亥革命、北洋军阀、国民革命、南京政府等革命运动或政治势力所依靠的“友邦”与所反对的“帝国”，都各有侧重；亲美亲苏亲日亲英的政客、资本家、革命者和自由知识分子，也各有其利益盘算和文化趣味。这就带来了反帝话语的纷乱，使得半殖民地内部在反帝问题上常常难以取得一致，从而造成了反帝的限度，即“有限反帝”。这是多重帝国宰制下半殖民地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

我们可以追问：“反帝”反的是哪些帝国主义国家？谁在反帝？什么时候反帝？通过追问这些问题，我们就能理解什么是“有限反帝”。

首先，“有限反帝”体现在反帝浪潮有起有伏。义和团运动是清末反帝的高潮，但很快失败。20世纪初的十余年，“可算是中国人对外不反抗的时期”^[6]。文学创作的情形也大致如此。无论是暴露社会黑暗还是幻想未来社会的创作，都不以反帝为主旨。例如，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谴责的是晚清官场、商场和士子的腐朽混乱、道德颓败；《痴人说梦记》《冰山雪海》《新石头记》《电世界》等乌托邦小说固然表达了对种族压迫和西方强权的不满，但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反帝意识，而是申张了文明战胜野蛮的观念。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列强“干涉与瓜分的噩梦渐渐远了”^[6]，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觉心得以唤醒。一战爆发后，欧洲残破，德、奥衰败，沙俄时代结束，中国的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国家地位亦在国际舞台上大幅提升，反帝的声音相较于晚清时期而言反而减弱了。在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的领袖“主要关注中国国内的弊病。他们思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使他们基本上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行为不作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的种种弊病主要归因于外国”^{[2](480)}。茅盾回顾五四文学时坦言：“五四”是以“反封建”为号召，“反帝国主义的作品简直没有产生。”^[7]共产党人李达感叹：“如今还有许多学者先生们只认定(国内)武人政治是万恶，却不承认帝国主义有侵略中国的事实，甚至要为帝国主义辩护，说现在的中国已经脱离了侵略的危险了！”^[8]李达的看法并非无的放矢。基于一战后45国签署的《国际联盟盟约》所确立的以和平为基调的国际新秩序，中国暂时摆脱了主权和领土遭受进一步践踏的厄运，其殖民论述表现出“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迹象，阮湘的《殖民》承认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相互受益主义”^[9]，吴应图的《殖民政策》认为列强“争谋殖民人民之安宁幸福”^[10]，二者皆有美化殖民活动与帝国主义之嫌。

直到“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国才真正进入民族觉醒和广泛反帝的时期，中国现代作家反帝书写的情感浓度和揭批力度，也在这时到达了历史高点。茅盾的《五月三十日的下午》、叶圣陶的《五月卅一日急雨中》、王统照的《烈风雷雨》、郑振铎的《街血洗去后》、朱自清的《血歌》等作品，都怀着满腔的愤怒，把帝国主义的屠杀视作恶魔行径，因而“祈求热血来洗刷这一切的强横暴虐”^[11]，“情愿将此混沌的世界来重行踏反，重行熔化，重行陶铸”^[12]。“五卅”运动之后，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态度也随之转向，胡秋原就揭示了殖民的罪恶：“在近代殖民政策的后面，却是一幅人类恐怖的写真。不是一幅文明移动的图画，而是一幅血肉狼藉，充满了残暴，悲惨，号泣，死亡，使人战慄悲愤的图画！”^[13]此后，中国与列强的冲突间歇性地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帝运动。

其次，“有限反帝”体现在半殖民地政府并不总是与民众站在一起，且试图操控民众与知识分子的反帝意愿。自1858年允许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后，就不断发生民众“打教堂”的事件，朝廷多次下令保护教会，如1891年朝廷命令保护外国教会，1895年命令保护教会及禁止谣言，1899年命令官吏消除教会之困难，并保护教士之来往^[14]。当义和团疯狂攻击传教士和外国人时，清政府最初利用了义和团的仇洋行动；当庚子事变失败后，义和团则成了朝廷追剿的对象，在条约中被表述为“拳匪”，而侵华的八国则成了“友邦”^[15]，并下诏声明从此严禁排外。在半殖民地中国，政府对民众的反帝意愿常常加以控制与利用。对国际法和外交史颇有研究的周鲠生，在国民革命期间提出对列强实行“革命的外交”。“革命的外交”要义之一，就是“利用民众势力”^{[16](2)}：“真正革命的外交，应当对照国际的情形及国内民众的力量决定方针，知道在甚么时候民众运动可以利用，而到甚么限度，

可以停止”；激发民众对日本、英国采取罢工和排货运动时，“革命的外交”要懂得“如何支配民众”^{[16](5-6)}。然而，“国民党对付外国势力特别软弱无力，因为它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地都在沿海城市，帝国主义的力量在那里是最强大的”^[17]，因而在反帝时常常妥协，甚至代替帝国主义“镇压大众的反帝运动”^{[18](48)}。国民党政府在反帝反殖运动中对民众的利用与支配，以及对帝国主义强权的不时妥协，造成了其反帝话语缺乏连贯性、稳定性，甚至走向了民众的对立面。这也为新一轮革命话语的建构提供了依据。

“左联”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时，把国民党政权归结为“代表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利益”^[19]。因此，在左翼文学中，反帝总是与反资、反国民党政府相联结，丁玲的散文《五月》代表了这一创作路向。《五月》依靠各种场景、各种人物的转换与并置来构设反帝话语，在上海都市的夜晚，法国的三色旗、美国的星条旗、日本的太阳旗和大英帝国的旗帜在微风中吹拂，喻示了上海的殖民性质；“酒醉的异国的水手”“科长，部长，委员”“白色的、黄色的资本家和买办们”^{[20](8)}，共享迷醉奢靡的上海夜生活，而难民、劳工、农民则处于深重苦难之中，两相对照，喻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客、资本家相勾结，共同造成了民众生活的灾难重重。描绘了上海都市的帝国强权、阶层压迫图景之后，文章进一步通过地下印刷所排印的新闻通讯，把反帝叙事处理为民众抗日和国民党“剿共”的对照图景。一方面，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东北义勇军“为反对政府的不抵抗，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劳苦大众的利益而组织在一块，用革命战争回答着帝国主义的侵略”^{[20](9)}；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不顾民众失业、受灾，大动干戈忙于“剿匪”。而他们“剿匪”，“要保护的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是资产阶级的利益”^{[20](10)}，这无疑把国民党政府钉在了帝国主义走狗与帮凶的耻辱柱上，以此完成了左翼作家反帝话语的完整建构。在文章中，反国民党政府、反资本家的叙事分量显然超过了反帝，阶级革命观念压倒了反帝观念，这就造成了反帝叙事的限度。这种反帝叙事情态，在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中较为多见。可以说，无论半殖民地政府还是革命作家，出于不同的考虑，诉诸的都是有限反帝。

再次，反帝话语的生产受到中国机构和在华外国势力的新闻检查制度的双重约束。租界、租借地是新闻舆论、文艺创作的中心地带，其反帝话语的生产却受到外国人的查禁与压抑。在华外国势力对“反帝”的新闻言论与文艺作品一直采取压制、取缔的态度，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关于电影检查之报告”中写道：“含有政治意味之任何影片，在经核准演映以前，例须由特务股主任报告警务处处长。”^[21]这就造成以“三反主义”（反帝、反资、反封）为号召的新兴电影，其银幕上很难看到“反帝”的镜头^①。可以说，在取消“治外法权”^②、收回租界和租借地之前，半殖民地中国的反帝书写，必然处于抑制的状态。

最后，“有限反帝”体现为对列强的态度在“帝国”与“友邦”之间不断切换。民国政府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上，排日与亲日的外交政策轮番上演。1919年日本驻华大使抗议排日运动，1920年北洋政府取缔排日，以便交涉山东问题^[22]。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全国民众及本党党员应集中于中国国民党指导之下作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反日运动”，“本党攻击对象全在日本政府”，以及推动对日经济绝交^[23]。这似乎表明国民党政府把排日反日作为了党政国策，但是在半殖民地中国，排日反帝并不总能够自由展开。1935年初，在日本不断蚕食侵犯中国国土的情形下，日本外相发表所谓“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演说，1935年2月13日南京政府下令“取缔排日”。与苏俄的关系也是反复无常，1904年国人期望日本战胜俄国，1924年国民党采取联俄容共政策，1927年中苏断交，1929年中苏绝交，1932年中苏恢复邦交。总之，从晚清朝廷到南京政府，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不断反复，时而把列强当作“帝国”，时而当作“友邦”。列强以“帝国”与“友邦”的双重形象不断切换时，政府的威信就在对外态度的反复中损耗，民众与知识分子感到被愚弄，对当权者和军阀官僚产生深深的不信任感，从而把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看作是帝国的帮凶，这也激发了反帝、反资、反本国统治阶级三位一体的文学创作模式。

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大量的反帝书写。支持这种主观印象的依据是：“反对帝国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实际情形并非全然如此。尽管半殖民地中国必须反帝，也有生产反帝话语的空间和能力，但是半殖民地反帝话语的生产是受限的，呈现出“有限反帝”的特征。反帝话语既受到半殖民地政权对外的“独立性与附庸性”和对内的“独裁与民主”^{[18](55)}的制约，又受到租界、租借地的外国新闻检查制度的压制，还受到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限制。20世纪30年代似乎应该是反帝主题的文学创作最为繁盛的时期，然而，并未出现“向外反帝”书写的热潮。在“左联”看来，“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统治最弱的一环”^[19]，国民党宣扬的民族主义属于欺骗性的“反革命的思想与文学”^[24]，因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之一即为“反对民族主义”，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也要求中国左翼作家“加紧反民族主义文学”^[25]，其结果造成了“左联”成立以后“忽略了反帝反封建的文学”^{[26](329)}。在党的战略调整和日本加紧侵华的背景下，萧三指示解散“左联”，要求创作策略转向“革命民族战争时代的革命民族文学”^{[26](332)}。这一转向，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让左翼作家无所适从，“放下了笔不写或写不出来”，他们“过去熟悉阶级对立的社会生活”，一时还不能适应“一致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新形势，因此“大部分人都写不出东西来了”^[27]。可以说，半殖民地中国为反帝所准备的历史条件，既拓展了现代文学的题材和思想，也压制了反帝书写的热情，使得反帝书写缺乏连贯性、一致性和系统性，造成了有限度的反帝书写状况。

二、“向内反帝”话语的生成

尽管“向外反帝”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但仍然难以改变文学史留给我们的整体印象：文学中充斥着大量的反帝书写。这是因为，还存在另一种“反帝”，即“向内反帝”，我们对文学反帝的印象，也主要来源于“向内反帝”书写。

在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文化进程中，“外国”因素的影响无处不在，但是在中国人书写的历史中“出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外国人几乎消失了”^{[2](4)}。这不难理解，作为解殖民与重建主体性的一种方式，中国人需要书写自己的历史，而不是外国人高度参与的历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反帝书写中，也存在一个类似现象——代表帝国主义出场的人物，主要不是来自列强的外国人，而是本国的近洋人物。这算是半殖民地国家的一种特殊反帝文化，可以称之为“指向半殖民地社会内部的帝国主义批判”，简称“向内反帝”。

反帝本应主要针对来自外部的帝国主义势力，而不是在国家内部寻找“替罪羊”。但是，帝国主义势力在半殖民地中国往往以“在地化”的方式存在，如：列强根据条约在中国设立租界、租借地，驻军，传教，享受治外法权，部分侵夺控制中国的关税、交通、金融、工业、矿产资源等方面的权利；而且殖民权力、西方观念常常通过“代理机制”现身，如：革命党与政府都聘请外国顾问，中外贸易由买办代理，新式知识分子多为西方文明优胜、本土文明低劣的积极传播者。帝国主义的“在地化”与“代理机制”，使得近洋人物和军政集团被裹挟到帝国主义的事业中，他们自身成了内部帝国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促进了西方文明和帝国霸权在中国内部的衍生流转。由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无论社会思想还是文学创作中的反帝表述，反对近洋同胞和本国政府的声音，甚至盖过了反对帝国主义者本身。如：革命知识分子回顾义和团运动和辱国殃民的《辛丑条约》时，叫出了“向国际反帝国主义的联合阵线”进攻的口号，在具体表述中，“打倒军阀”被置于“打倒帝国主义”之前^[28]，这意味着军阀属于应该被打倒的罪魁祸首。而且，“向外反帝”有时会转化为内部的纷争。1925年9月初，胡适针对“五卅”运动的发展态势写道：“上海的罢工本是对英日的，现在却是对邮政当局，商务印

书馆,中华书局了。北京的学生运动一变而为对付杨荫榆,又变而为对付章士钊了。广州对英的事件全未了结,而广州城却早已成为共产与反共产的血战场了。三个月的‘爱国运动’的变相竟致如此!”^[29]因此,文学叙事常常以“反资”代替“反帝”,资产阶级、军阀官僚、假洋鬼子、西崽、买办等近洋人物,成了帝国主义的替身;这些人物被认为与帝国主义勾结,须为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负责。

作为殖民者的外国人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反帝书写中的缺位现象或后台化处理,其成因有多个方面。一则缘于前文提到的外国势力、晚清民国政府和左翼革命组织对反帝话语的约束。二则晚清民国时期在华的外国人数有限,多的时候不过二三十万,而且一半以上是日本人;这些外国人集中于上海、天津、汉口、青岛、哈尔滨等少数城市,绝大部分中国人与他们没有直接接触和私人交往,而是通过租界制度、洋场景观、洋货、买办、西崽、留学生等中介事物与人物,间接与“外国”产生关联。三则现代作家所交往的外国人,相互以“友邦”人士相待;现代作家看待通商口岸城市的外国元素,多着眼于“都市西方”,而他们接触、观察到的“殖民西方”往往位于城市公共空间,在此空间与外国人的交往冲突是即刻的,陌生人之间的,外国主体是泛指,如街上的外国巡捕、码头的海关检查员、电车上的外国人座位专区、租界公园的入园规则等。在公共空间、即刻时间、符号化外国人身上发生的相关殖民事件,组成了“殖民西方”书写的主要模式。这种片段化、场景化的书写模式,难以对外国人/殖民者进行持久的观察,难以生发出连续性的故事情节,极少塑造性格丰满的外国人形象。很多时候,作为帝国权势的外国人在文学叙事中并不出场,而是作为后台人物或隐性力量操控半殖民地的经济市场,压榨、伤害中国工人。茅盾《子夜》、夏衍《包身工》这样明显具有反帝意味的作品,也未见外国人在故事中出场。老舍、郭沫若、郁达夫、鲁迅等作家,曾在半殖民文化视野下塑造了一些外国人形象,但几乎是身在日本、英国本土的外国人,而不是在华外侨。像彭家煌的《Dismeryer先生》和《教训》、萧乾的《昙》等细描在华西洋人形象的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较为少见。半殖民地的仇洋情绪,也妨碍了现代作家近距离打量外侨的生活世界和在华体验,局限于把他们当作类型化、符号化的帝国主义者加以描绘。对照外侨的回忆录——《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小洋鬼子:一个英国家族在华生活史》等关于西方殖民者在华生活的叙述^③,我们就能看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外国人形象塑造,是多么概念化与单一化,这也影响了现代文学反帝书写的思想与艺术深度。

在中国现代作家的反帝书写中,“外国人”形象的缺位或后台化处理,缘于半殖民地政治语境的限制和作家对在华外侨的隔膜。但是,现代作家对假洋鬼子、高等华人、西崽等文化上的近洋人物非常熟悉,对资本家、买办、官僚等政治经济上的近洋人物也有近距离接触和观察的机会,并可以利用半殖民地“两种社会”“双城模式”提供的政治空间,获得言说近洋人物的话语权。这些近洋人物的思想、言行和生活,就是一般国人所能接触到的“外国”,他们也被国人视为盘剥欺侮民众的“帝国主义”,守旧者则把传统社会失序和自身价值贬抑归罪于近洋人物。由此,就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向外反帝”书写的薄弱和“向内反帝”书写的繁盛。

“向内反帝”话语系统的形成,基于半殖民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半殖民地政权具有“独立性与附庸性”“独裁与民主”^{[18](55)}的二重性,再加上晚清“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传言和国民党政府“攘外安内”的政策,导致革命知识分子视本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和替身,因此反帝就以内部解殖民为主。鲁迅的杂文,最擅长揭示这一点。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侵略半殖民地的重要手段”^{[18](50)},并在口岸城市就地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本家、买办、工厂主和工头,他们被视为帝国主义经济殖民的一部分,也是压榨盘剥工人、造成乡村经济破产的罪魁祸首,反对他们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茅盾的《子夜》和“农村三部曲”等小说对此多有表现。在半殖民地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秉持民族主义立场的革命群众和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把因近洋而取得了优势地位的人群,视作“非我族类”,形同卖国。鲁迅写

道,“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可是这转移是极容易的,虽曰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候,只要给与一种特异的名称,即可放心割刃。先前则有异端,妖人,奸党,逆徒等类名目,现在就可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30]。在批判帝国主义时,假洋鬼子、西崽、留学生、小资产阶级等群体因此被牵连。

由以上分析可见,中国现代文学所建构的“向内反帝”话语,实则基于半殖民地的社会和文化性质。相对于“向外反帝”来说,“向内反帝”可以避开列强的干预,保持话语的持续输出,为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抗日战争等社会革命提供话语支持,从内部改变国家的半殖民地性质,从而达到反帝解殖民的目的。由此,“向内反帝”话语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反帝解殖民书写。

“向内反帝”也为拆解半殖民地多层次的主奴社会结构提供了方案。《文明小史》《痴人说梦记》等近代小说描画了半殖民地的权势关系结构图:外国人压迫晚清朝廷——朝廷迫害维新人士、地方官吏欺压民众——维新人士、普通民众寻求外国人的庇护,由此形成了半殖民地内部相互制约的权力怪圈。到了民国,这个权力怪圈衍化成了新的社会阶级结构。随着列强对华殖民宰制的全面展开,西方势力在中国“创造出与传统秩序截然两样的世俗等级制度”^[31],那些在传统秩序中被贬抑、被排斥的人群,如“洋鬼子”“买办”“传教士”“西崽”,都被组织到新的社会权势关系中。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外侨在中国汇合成了一个“外来社会”。治外法权、特权身份^④以及西洋文明的加持,使得“外国人”在半殖民地成为一种超级身份。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与西方文明的入侵,在半殖民地中国造就了新的知识群体和职业群体,如留学生、买办、实业家、律师、医生、大学教授等,新兴群体拥有资本主义经济资本和西方现代知识资本,跻身“高等华人”之列,冲击了既有的由政治特权与儒家传统所决定的社会阶层制度。由此,半殖民地中国的内部权势结构被重塑,形成了新的主奴社会结构。对于半殖民地国家和国民的地位,新旧知识分子都喜欢以“奴”来表述,如:“亡国奴”(郭沫若《月蚀》),“我们整个民族已做了八十多年的奴隶”(胡汉民《誓雪半主权国与次殖民地之耻》),“吾国固奴隶之国,而学固奴隶之学也”(黄节《〈国粹学报〉序》)。老舍有篇小说名叫《浴奴》,孙中山认为“中国不只做一国的殖民地,是做各国的殖民地;我们不只做一国的奴隶,是做各国的奴隶”^[32]。“奴”是由“主”来定义的,有“新主”就有“新奴”,在主奴之间,还有“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33]的“高等华人”存在,由此就形成了半殖民地多层次的主奴社会结构。鲁迅多次写到半殖民地的主奴社会: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34]

上海是: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35]

无论“西崽”“巡捕”“翻译”,还是“民族主义文学家”“高等华人”,在鲁迅的笔下,都是帝国主义的“奴才”和“鹰犬”。他们寄生于半殖民地多层次的主奴社会,有着媚外与守旧、奴才与主子的两副面孔,对洋大人俯首帖耳,对华人颐指气使。他们的存在,还被帝国主义用来“以华制华”——“对付下等华人的有黄帝子孙的巡捕和西崽,对付智识阶级的有‘高等华人’的学者和博士。”^[36]在《推》《电影的教训》《“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题未定”草》等文中,鲁迅对奉洋人为“主子”,自居于众华人之上,甘做“洋奴”的近洋人物进行了反复描摹。要反对帝国主义,改变半殖民地的主奴社会结构,那么,“向内反帝”便显得至关重要。要解除帝国主义的超级身份、拆解半殖民地社会的主奴结构,就可以从半殖民地等级社会的中间环节、中介人物“洋奴”或“高等华人”入手。1933年新年伊始,叶圣陶梦想的未来中国,其中一条就是“‘高等华人’绝迹”^[37]。“向内反帝”是自内解殖民的重要方式,显明了现代作家对国家平等与国民平等的双向追求。

三、结语

“有限反帝”与“向内反帝”，构成了半殖民地中国反帝话语的基本形态和实践路径。半殖民地统治机构和革命组织的反帝话语形态常常趋向一致，其区分仅体现在指认的帝国主义对象(日本、沙俄、美、英、法、德等)和帝国主义“代理人”(清朝皇权、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买办、资本家、崇洋媚外者)有所不同，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反帝书写的丰富形态。从“有限反帝”与“向内反帝”出发，可以发现反帝话语的建构并非上下阶层、左右派别步调一致的一项话语实践，这就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反帝性质并非不言自明。只有把反帝话语置于半殖民与解殖民的语境之下，在反帝与民族主义、现代国家、民主平等、阶级革命、文明观念等的多重关系中加以考量，才能发掘反帝话语的内在张力和丰富内涵，中国现代文学的反帝性质方能落到实处，“反帝”在思想史与文学史中才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

注释：

- ① 具体论述可参见李永东：《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近现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0—222页。
- ② “每个国家对这项权利条款都有不同的表述，就法国的情况而言，治外法权除了司法赦免特权和保教权之外，还包括国民在所有开放港口定居和自由经商的权利，战船停靠中国主要港口的权利，对几处公共行政部门进行共同管理的权力，滇越铁路承包权，租界(共四处，不包括上海和厦门的国际公共租界)以及广州湾租借地管理权，等等。”参见安托万·瓦尼亚尔：《广州湾租借地：法国在东亚的殖民困境(下卷)》，郭丽娜、王钦峰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4页。
- ③ 具体论述可参见李永东：《民国城市的文学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370—395页。
- ④ “通过治外法权的法律制度，口岸里的外国人被给予相当于士大夫统治阶级本身所有的那种特权地位。例如，传教士和儒生都可以不受县官的笞刑。”参见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5页。“天主教与中国官厅往来的关系，于光绪二十五年得清帝之许可，存案于总理衙门；主教(Bishop)与总督巡抚同级，总神甫(Head Priests)与布政使，按察使及道员同级。其余同于府县官。”参见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762页。

参考文献：

- [1] 杜赞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 王宪明, 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215.
- [2]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M]. 杨品泉,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3] 国际联盟盟约[M]// 伍朝光. 国际组织大纲. 上海: 朝岭学社, 1934: 217-234.
- [4] 屈维它.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J]. 前锋, 1923(1): 40-50.
- [5] 九国间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九条[M]// 万仲文. 中国外交之史的分析. 桂林: 广西建设研究会, 1940: 113.
- [6] 胡适. 胡适全集: 第3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828.
- [7] 茅盾. 茅盾全集: 第19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311-312.
- [8] 李达. 何谓帝国主义[J]. 新时代, 1923(1): 1-7.
- [9] 阮湘. 殖民[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4: 7.
- [10] 吴应图. 殖民政策[M]. 上海: 中华书局, 1924: 15.
- [11] 茅盾. 茅盾全集: 第11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17.
- [12] 王统照. 王统照散文选集[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2: 45.
- [13] 胡石明. 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概要[M]. 上海: 大东书局, 1929: 2-3.
- [14] 周谷城. 中国社会史论[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9: 762.
- [15]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一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1009.
- [16] 周鲠生. 革命的外交[M]. 上海: 太平洋书店, 1928.

- [17] 帕克斯·M.小科布尔. 序言[M]//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 1927—1937. 蔡静仪, 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5: 17.
- [18] 陈洪进.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M]. 上海: 黑白丛书社, 1937.
- [19]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C]// 文学运动史料选: 第二册.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201.
- [20] 丁玲. 丁玲全集: 第5卷[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8.
- [21] 上海租界工部局.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M]. 上海: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 1933: 17.
- [22] 万仲文. 中国外交之史的分析[M]. 桂林: 广西建设研究会, 1940: 139.
- [23] 李欣荣. 抗战前中日关于排日教科书的争端与交涉[J]. 近代史学刊, 2016(2): 98–114.
- [24]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J]. 文学导报, 1931(8): 2–7.
- [25] 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对于中国无产文学的决议案[J]. 文学导报, 1931(8): 7.
- [26] 萧三. 给左联的信[C]// 文学运动史料选: 第二册.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 [27] 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 座谈会纪录[J]. 七月, 1938(3): 74–82.
- [28] 慰. 辱国殃民之丑亥和约[N]. 向导周报, 1924–09–03.
- [29] 胡适: 爱国运动与求学[J]. 现代评论, 1925(39): 5–9.
- [30]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38.
- [31] 许宝强, 罗永生. 解殖与民族主义[C]//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60.
- [32]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 第9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01.
- [33] 鲁迅. 鲁迅全集: 第6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367.
- [34] 鲁迅. 再谈香港[J]. 语丝, 1927(155): 1–6.
- [35] 鲁迅. 鲁迅全集: 第7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325.
- [36] 鲁迅. 鲁迅全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115.
- [37] 新年的梦想[J]. 东方杂志, 1933(1): 1–83.

The construction of anti-imperialist discourse in semi-colonial China

LI Yongdong

(School of Literar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wo tendencies dominating the anti-imperialist discourse in semi-colonial China: “limited anti-imperialism” and “inward anti-imperialism”, which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thinking style and the anti-imperialist writing mode in modern China. Imperialism in China was extremely complex as the government’s stance towards anti-imperialism shifted with the political climate and diplomatic discourse oscillated between describing foreign powers as “imperial powers” and as “friendly allies”. In the context of multi-faceted power struggles, anti-imperialist discourse was often suppressed, lacking coherence and consistency, resulting in “limited anti-imperialist” writing. In anti-imperialist writing, “anti-capitalism” often substitutes “anti-imperialism”, and the image of foreigners often tend to be absent or relegated to the background while characters from neighboring regions become the primary targets of imperialist critique, leading to a weakening “outward anti-imperialist” narrative and a flourishing “inward anti-imperialist” discourse. The “inward anti-imperialist” discourse dominates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colonial writing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dismantling the master-slav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semi-colonial society.

Key words: semi-colony; imperialism; limited anti-imperialism; inward anti-imperialism; outward anti-imperialism

[编辑: 陈一奔]